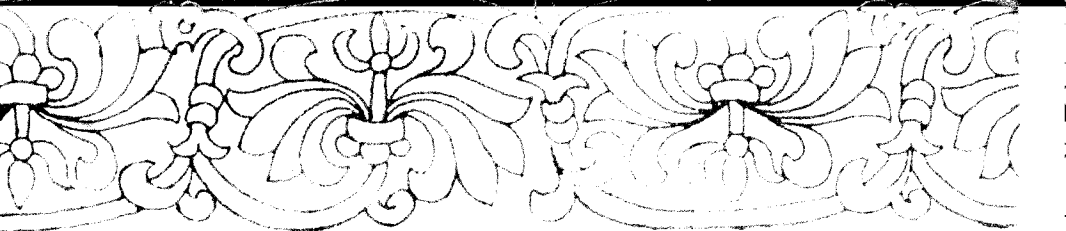


北宋胡壇

陶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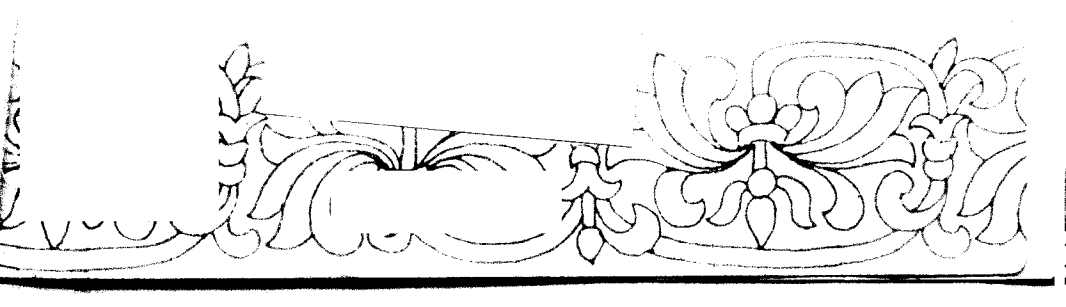




北宋詞壇

陶 尔 夫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北 宋 词 坛

陶尔夫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5 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册

*

书号: 10088·925 定价: 1.10 元

引 言

这是一本评介北宋词坛的小书。编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为了向青年读者们系统介绍北宋词的发生、发展过程，介绍北宋时期的主要词人和他们的作品，以便为学习和研究宋词提供一个初步基础。

在进入正题以前，首先对词、对词的起源以及词在北宋以前的发展情况，作一个必要的介绍。

词跟诗有什么不同呢？词，是音乐文学，是一种句式长短不齐的、可以入乐歌唱的抒情诗。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形式，跟唐代兴起并定型化了的律诗、绝句一样，具有严密的格律限制，简单说来，即每首词都有固定的词调，而且“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是不能随意增减变换的。这就使词在形式上跟诗有明显的不同了。词之所以跟诗歌有所不同，并且在格律上有自身的特点，这是由它的音乐文学这一特殊性质决定的。词之所以具有这一性质，又是跟它的起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词的起源，前人曾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大致有：出于《诗经》，出于乐府，出于六朝杂言以及出于唐代近体诗等不同说法。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只着眼于词的长短不拘的形式而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既然，词是可以歌唱的抒情诗，那

么，我们就应当从“音乐文学”这一特性来考察它的起源，来分析和归纳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原来，中国古代音乐在宋以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秦以前流行的音乐被称之为“雅乐”，汉魏以来流行起来的音乐被称之为“清乐”。隋唐之际，中国古代音乐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发展与大高潮时期。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全面繁荣，西域音乐（古代称为“胡乐”）通过经商、通婚、宗教、武功等多种渠道，源源不绝地传入内地，并与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相汇合，于是一种新的音乐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兴的音乐，节奏鲜明，旋律欢快，音调丰富，善于表情达意，深受下层人民的喜爱，传统的“雅乐”、“清乐”相形见绌，因而很快就被这种新兴的音乐所取代了。这种新兴的音乐被称之为“燕乐”（“燕”，就是“宴会”的“宴”）。词，也就是配合这种新兴的“燕乐”而写下来的歌词。它的特点是先有了音乐的曲谱，然后再“倚声填词”，而不是先有了歌词然后再依词谱曲（当然，个别情况例外）。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旧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上面提到的“曲子”、“胡夷里巷之曲”即指“燕乐”而言，同时还说明了，这种新兴音乐来自西域（“胡夷”）和产自民间（“里巷”）。隋唐以来，这种流行的乐曲在崔令钦的《教坊记》中录有三百二十四调，其中，成为唐、宋词调的即有七十余曲。后经唐、五代以及两宋乐工、歌伎和通晓音律的词人的创制，词调竟发展到六百六十，词体有一千八百余种（见万树《词律》）。清康熙晚年编就的《钦定词谱》在此基础上竟增至八百二十六调，二千

三百零六体。可见唐、宋时中国音乐的发展是如何繁盛了。实际上，词，就是隋、唐以来逐渐形成的这种新兴音乐的狂飙运动的产物。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值得庆幸的是，一九〇〇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石窟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我们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辑词一百六十余首，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中已增至五百余首）。就现在发现的敦煌民间词来看，其内容是相当广阔的。其中“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见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其中最突出的是歌颂爱国统一这一内容的作品。如《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献忠心》（“生死大唐好”）等。这些词表达了“安史之乱”以后边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热诚盼望国家强盛使大唐帝国再获统一这一强烈愿望。此外，有的民间词还反映了商人游子的旅况与艰辛，反映歌伎舞女的恋情生活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有的词还抒发了征夫思妇对不义之战的厌倦情绪，等等。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的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扩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

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中唐时期填词的文人逐渐多起来了，其中著名的有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有较大影响。它词语清丽，描写生动，很有民歌风味。词中渔父的形象和情趣，实际上是逃避喧嚣官场的隐士，因此，这首词很被文士所激赏。韦应物的《调笑》（“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写西北草原风光，气象开阔，雄浑如画，风格遒劲，与当时一般词风有所不同。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填词比较多的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描绘江南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表现了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风格清新明快，流传甚广。刘禹锡在洛阳时也以《忆江南》词调相唱和，并自注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曲拍为句”的提出，总结了唐代配乐填词的经验，把词的写作自觉地提高到倚声填词的新阶段。晚唐五代词的创作之所以有一个大发展也正是中唐时期词创作经验积累和“依曲拍为句”这一理论提出的必然结果。

晚唐五代词的创作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已收词一千一百四十余首，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晚唐五代是社会大变乱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广大中

原地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词这一新兴的诗体形式，在远离变乱之灾的西蜀和南唐两个地区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则是，这一时期的词，大多数是酒席筵前供人享乐和娱宾遣兴之作。其中虽也不乏感情真挚、意境深婉的佳篇，但整个看来，社会的动乱，时代的风貌在词里却很少有直接反映。这一点在当时辑录下来的《花间集》中暴露得最为明显。《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의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欧阳炯（五代词人，先事前蜀，为中书舍人，后事孟知祥，官至宰相，最后降宋）曾为《花间集》作序，其词曰：“镂金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正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两段话充分说明《花间集》选录作品的特点以及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可见，《花间集》中描写恋情相思与男欢女爱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绝非偶然。当然，集中也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作品，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毛文锡的《甘州遍》（“秋风紧”）反映了边塞生活；鹿虔扈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反映了亡国的哀痛；李珣《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写舟子行客的高愁，而《南乡子》十首则描绘了南国风光，其中写岭南生活的作品尤有鲜明特色与独到之处。

在晚唐五代词人当中，影响最大的词人是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和李煜。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词人，本不属“花间”范围，但却被后人称之为“花间”鼻祖。《花间集》选录他的词有六十六首之多。他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大词人，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词含蓄委曲，言尽而意不尽。后代对他的词评价也颇有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词感情比较深隐，意境比较朦胧，不大好懂。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与“水晶帘里玻璃枕”等），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前人的解释出入很大。温词之所以朦胧深隐，这是因为他的词主要借助于标举名物和客观形象的罗列，而不是靠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他的词画面密集，跳跃性很强，加之词语华丽，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婉隐曲与华美浓艳的艺术风格。当然，温词也并非都是朦胧隐曲之作，他也有一些清疏明朗的词，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但是，代表温词风格与特点的却不是后者，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词。尽管温词存在明显的局限，但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却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影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开始成为新的诗体形式之一；二、开拓了词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婉约词派，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韦庄生活于唐末与五代这一变乱时期，他五十九岁中进士，六十六岁入蜀，七十二岁时前蜀王建称帝，他当了宰相，七十五岁就死了。韦庄不仅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五代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温、韦并称，有人还把他们归为一派。其实，温、韦二人的词是有明显不同的。韦庄词的特点是以热烈的主观抒情见长，表现出一种率直劲切与清疏淡远的风格。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

年今日，别君日，忍泪伴低面，含羞半敛眉。”等。他的著名的五首《菩萨蛮》也都具有率直显露的特点，与温词的朦胧深隐，判然有别。韦庄词对李煜、苏轼、辛弃疾有较大影响。

五代词除西蜀以外，另一创作中心便是南唐。南唐拥有三十五个州，在当时号称大国。在中原各小国相互征伐的战乱时期，南唐没有遭受过战争的破坏，经济反而有所发展。但是，面对后周的强大，继之又面对赵宋王朝的兴起，南唐君臣预感到国家必然灭亡的末日一天天临近，却又无力自振，无法摆脱。于是便在歌舞酒宴之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暂时的逃避。词，作为歌舞酒宴上遣兴娱宾的唱词，由此而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南唐与西蜀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唐无人把词加以整理结集，因此保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有影响的只有李璟、冯延巳和李煜等少数几个词人。西蜀的词人，多数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词的作者却只有皇帝和权臣。

冯延巳曾经是一个身居相位的词人，但他笔下的词却很少有欢乐的歌唱。他的作品往往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甚至是深情的叹惋。他善于以清丽的笔墨抒写时代的悲凉，反映了他已意识到国家必将灭亡但又无法摆脱覆亡命运这一深刻矛盾。从艺术上看，冯延巳词既有温庭筠那种色彩丰富的客观形象的描绘，同时又有韦庄词中那种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写。不过，由于他所抒写的已不仅仅是一己之情的感歌，而是揉进了家国兴亡的慨叹，所以，他的词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与概括性。如《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可以看出，这样的词已与前面的温庭筠、韦庄有所不同了。这标志着五代词继温、韦之后在意境上和艺术手法上已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冯延巳对宋代的晏

殊、欧阳修等词人有较大影响。王国维说：“冯正中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是南唐最后一个小皇帝。在李煜嗣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在中原建立了宋政权。李煜在位的十五年中继续执行其父李璟的政策，对宋纳贡称臣，妄图维持苟安的局面。当然，这只是必然要破灭的残梦。宋太宗开宝八年（公元975），宋灭南唐，李煜亡国被俘后，在汴京过了三年囚徒生活，后被毒死。李煜早期的词多描写耽溺于享乐的宫廷生活，调子是香艳的。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等。亡国之后，身为阶下囚徒，安危不能自保，感情陷于极度悲痛之中，调子是悲凉的。但他后期的作品，意境扩大，感慨深沉，力量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他的词，风貌天然，能以常人的感情去体验、观察和反映他所感受到的生活，故而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他的词，清词丽句，锦心绣口，用语娴熟，纯净凝炼，擅长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的本色。李煜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虽然，前人认为李煜词不出婉约的藩篱，但是，他的词的意境，他那坦率的抒情性，他那俊逸神飞、任纵奔放的风格，却又不是“婉约”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已不光是婉约词人，连被称为豪放词人的大家，如苏轼、辛弃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响。

从温庭筠到李煜，词的创作从感情的深隐转到直接抒写亡国之痛，词的内容丰富多彩了，手法也多姿多样了，艺术上也臻于成熟了。所以，唐五代词不仅为宋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同时，也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代周而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为了通过娱乐来消弭被解除兵权的贵族官僚的反抗，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俗乐”，连最高统治者也乐此不疲，甚至自制“新声”。据《宋史·乐志》载：“太宗（赵炅，即赵光义）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说：“仁宗（赵祯）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当时，许多达官显贵，或流连坊曲，或竟蓄声伎，在宴会及其他场合竞相填写新词。一时间，君臣上下均以能词为荣。宋史以能词而得官爵，以能词而受赏赐，比比皆是，佳话传说，广为流传。传宋神宗时蔡挺在平凉写了一首《喜迁莺》，其中有这样几句：“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倾侧。”神宗（赵顼）读此词后，批曰：“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缺，留以待汝。”不久，调蔡为枢密副使。又，宋祁因在街上看见官中车队内一女子，写了

一首《鹧鸪天》，宋仁宗知道他曾与宫女相遇之事，便有内人之赐。又如，《大宋宣和遗事》载，正月十五观灯时，一民间女子与家人失散，在赐酒时，她把金杯揣在怀里，被卫士发现，押至御前。她即席填《鹧鸪天》词一首，说明窃杯的原委：“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乞赐金杯作照凭。”这位女子当场得到金杯的赏赐。这说明，词，这一新兴的诗体形式，已经普及到一般妇女群众之中去了。

此外，有些词人还因有名篇佳句而被传为词林佳话。如宋祁因《玉楼春》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张先因在三首不同的词里分别用过“影”字而被人称为“张三影郎中”。秦观在《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而被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贺铸在《青玉案》中有“梅子黄时雨”而被人称为“贺梅子”。这些都说明，词，在当时是如何深受士子平民的喜爱和重视。宋词的创作比起唐五代来已有更大的群众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普及，没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词的繁荣便不会出现。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小令的繁荣期，慢词的兴起期，豪放词的创制期，词律的规范期。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

下面就准备按照上述四个阶段对北宋词的发展过程和重要作家作品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令词的繁盛期	(1)
第一节 北宋早期的小令	(2)
第二节 令词的重要作家	(8)
第三节 晏几道及其他小令词人	(31)

第二章 慢词的兴起期	(41)
第一节 慢词的兴起与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	(41)
第二节 秦观及其他词人	(65)

第三章 豪放词的创制期	(81)
第一节 词风的革新家苏轼	(81)
第二节 苏轼周围的其他词人	(101)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词人之林	(108)

第四章 词律的规范期	(128)
第一节 大晟府和大晟词人	(128)
第二节 周邦彦与词的格律化	(132)
第三节 赵佶及李清照早期的词	(146)
结 语	(156)

第一章 令词的繁盛期

从北宋开国（公元960年）至“靖康之乱”（公元1127年）的一百六十余年，历史上称为北宋时期。

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除西、北部分地区外，实现了统一，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日益兴盛，商业经济空前兴隆，大城市也随之兴起，市民阶层也因之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虽然北宋初期政治稳定，经济向前发展，但词的创作却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即到了仁宗（公元1023—1063）时期才开始出现全面繁荣的局面。所以，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只不过是长短句歌词中的短调，即一般称之为“小令”（或称之为“令曲”）的发展繁盛期。就现有资料看，“令”字的由来，大概是出于酒席之间的“酒令”，一般字数较短。就内容与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大体上是继承“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其中，受冯延巳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所写的，不外是春恨秋愁，伤离念远，恋情相思或咏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

词来，已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时代不同，作家生活遭遇不同，艺术个性不同，所以，尽管在内容上宋初小令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词的风貌，词的艺术手法已与唐五代有所不同，因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小令创作在此一时期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艺术上为宋词的高度繁荣作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小令作者为数众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晏殊和欧阳修，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和风格。

第一节 北宋早期的小令

王禹偁(chēng 称)(公元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进士。历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知县、右拾遗、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因直言敢谏而屡遭贬谪。

王禹偁是北宋最早改革华靡文风的诗文家，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后人据《宋诗钞·王禹偁小传》的外误，说王禹偁反对过“西昆”形式主义诗风。其实，王禹偁比“西昆”著名诗人杨亿年长二十岁，王谢世时，杨亿才二十八岁。《西昆酬唱集》编成于景德年间(公元1005—1008)，此时，王已去世六、七年之久，他不曾见过这部诗集，更谈不上反对和批判这本诗集了。但这并不影响王禹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禹偁以诗、文名世，但他又是一个最早填词的人。他传世的作品只有《点绛唇》一首，而这首词却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
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具有清新旷远的风格，与五代、宋初剪红刻翠、遣兴娱宾的作品截然不同。词一开始就捕捉住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突出了多云多雨这一地区性和季节性特点。尽管这“雨”使人添“恨”，这“云”使人生“愁”，但在作者眼里却仍然感到这一切都有迷人的魅力。所以，下面禁不住用赞美的语气写道：“江南依旧称佳丽”。“佳丽”，讲的是风景优美宜人。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之句。那么，这“佳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对此作了形象的补充和描绘。“孤烟”一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使至塞上》）。作者把王维的诗句略加改造，并使之与遍布江南的“水村渔市”相结合，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便跃然纸上了。当然，作者并不只着眼于“水村渔市”的刻画，他内心想的是更加远大的事情。所以，当“征鸿”从“天际”掠过之时，作者便止不住产生了振翼搏斗的遐想。《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作者以鸿雁奋飞来跟自己“平生事”相对照，于是便“凝睇（dì弟）”注视，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谁会凭栏意”的深长慨叹。

宋初小令多是遣兴娱宾、风月留连之作，即使个别作品含有伤时感怀的内容，风格也大都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王禹偁此词，即事即目，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了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